

徐敏： 印尼归侨身份 “边界” 流变初探（上）

【摘要】论文基于“边界”理论，将印尼归侨身份的“边界”建构放入纵向的时间维度探讨其“边界”的生成及变化。研究发现，印尼归侨身份的“边界”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遭遇他我之别时所“框定”的。在印尼，他们身份“边界”的表述核心是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认同。归国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其身份的“边界”表述则在自我和他者的“意会”中贴上了“印尼”标签，唤起的仅是对跨国经历和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。这一分类实践的变化，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，映射了不同身份的“边界”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印尼；归侨研究；身份认同；身份界定

【作者简介】徐敏，女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，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、华侨华人研究。

——原文载于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》2020年第2期

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，和华侨华人一样是中国独特的宝贵资源。新中国成

立后，较早的归侨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当时，归国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侨。其中又以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居多，约有13.6万人。华侨回国后，面临着与侨居地迥异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，存在着重新适应与身份认同的变迁等问题。

一、在侨居国：以“祖籍国”为核心的身份“边界”建构

本文所关注的印尼归侨，其祖辈、父辈于清朝后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广东、福建等沿海一带到东南亚国家“讨生活”，辗转在印尼定居。他们主要分布在爪哇、苏门答腊、西加里曼丹一带，多数以做小生意或从事体力劳动谋生。经过多年的奋斗与积累，其后代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。本文的访谈对象尽管都在印尼出生，但在访谈中提及最多的是其作为中国人的身份。他们生在印尼，长在印尼，是如何生成以“祖籍国”为核心的身份“边界”的？这种身份“边界”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一方面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自我选择。这种选择首先受家庭、社群的影响，并逐渐在不同的社会交往和行



动中得以框定。另一方面，侨居国政策、民族主义、大众媒体等构成的外部力量推动着个体对身份“边界”进行形塑。

（一）家庭、社群：“边界”的生成

春节是中国文化中最隆重、最重要的节日，它伴随着丰富、固定的习俗呈现出典型的文化象征意义。在访谈中，受访者多次提及在印尼家中过春节的情形。正是在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下，个体逐渐生成中华儿女的观念，并对遥远的“国家”形成大致图像，使他们确信这才是与之相联系的国家。

我1942年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小镇，祖籍广东梅县。出生时，父亲在印尼开杂货店。虽然家境算不上富裕，但也过得去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我们的父辈是从中国出来的。父亲的书法写得好，每逢春节邻居就

会请他写春联。后来家里宽裕些，父亲就捐资筹备华文学校。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按照客家人的习俗来过。

我们在邦加，那时还没有舞狮。但除夕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，过年有压岁钱，还有新衣服穿。我家大年初一还会吃素。

在这种身份认知下，他们在生活中与印尼本地人保持着一定的社会交往距离。据归侨张雅琳所言，他们居住在印尼华人社区中，虽不可避免地要和印尼本地人打交道，但社会交往半径仍局限在华人圈。她讲了一个例子：“我有一个伯母，她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上学时和一个印尼人相爱了要结婚。她坚决反对，也不去参加婚礼。二女儿找了一个华人，结婚时她就给他们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。当然也有华人

娶印尼老婆，但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。现在想来应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，还是太狭隘了。”

这一个案类似于巴顿提出的“族群关系的行动模型”，他更多关注的是个体、社会化，强调个体通过日常生活经历来区分或认同他们对其他群体的反映。案例中的“母亲”对两个女儿婚礼的态度截然不同，主要在于无法接受大女婿印尼人的身份。“母亲”对于女儿丈夫身份的考虑显然大于女儿的婚姻幸福。这个例子虽是个案，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华侨对与印尼人通婚的“排斥”。他们对通婚半径的考虑是出于担心同胞对自身的评判，以免影响在华人圈的活动和融入。时至今日，华人与印尼人通婚的现象仍不算多，尤其是女性嫁给印尼人的更少。因此，通婚半径的考量又促进了“边界”的再生产。

由此可见，归侨在侨居国身份“边界”的意识首先来源于家庭和社群的影响。

（二）外部塑造：“边界”的强化

人类学家陈志明指出，族群意识在现代的意义乃是因为国家对个人以及群体间